

■电影《革命者》观后

背黑暗而向光明的中坚力量

□刘凤彪

革命,是变革,是革故鼎新,是被压迫阶级觉醒后的勇敢抗争。革命者胸怀坚定信念、肩负崇高使命,是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是唤醒民众奋起反抗的先驱,是引领民众投身正义的志士。《革命者》这部电影从片名“革命者”就营造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巨大的吸引力,片中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都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革命者》不仅是一部艺术佳作,也是一部思想深刻、真实感人的党史教科书,是对早期党史的影像回放和情景再现,为我们描绘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如磐的初心、纯洁的党性和代表中国革命方向的先进文化。

影片以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38小时为故事主轴,生动还原了1912年到1927年那段拯救民族危亡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演绎了一代伟人革命人生的精彩传奇,展示了革命先驱投身中国革命、探索中国道路的赤诚之心,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温暖。片中的李大钊不仅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形象,也有文人教授、人夫父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透露着艺术的饱满质感,彰显着文化的无穷力量。影片以常见的故事情节、拍摄技巧在刻画人物形象、解读历史背景的同时,还巧妙地运用插叙、隐喻、旁白等多种艺术手法解构时局,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实感受革命的艰难危险,亲眼目睹革命者的无私无畏,用心体悟革命事业光明无限的美好前景。

正因其艰难危险,方知初心之未泯。影片

的视觉表达以黑色为主,昏暗的牢房、深夜的矿区、灰色的街道,特别是李大钊行刑前的黑白画面,对观众造成极大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压抑。在这种色彩背景之下,是李大钊高喊的“这是他们赐予我们的未来,但绝不是我们的未来”“反抗,斗争,革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深沉的画面、灵魂的追问,生动再现了我们党因反抗压迫、实现人民幸福而诞生的艰难背景。

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革命斗争、党的建设、改革开放使命的过程。这个过程筚路蓝缕,危机四伏,充满艰辛。而愈是艰难危险,就愈加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我们伟大事业的基础、伟大革命的开端乃至伟大建党精神,正是源于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的声声呐喊与勇敢牺牲。

正因如此无私无畏,才彰显党性之纯洁。李大钊入狱后,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但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至暗时刻,李大钊从容镇定,视死如归。他曾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我只不过是个

中间人,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能够让活着的同志们更加奋勇地前进,我可以去死,我应该去死。”共产党人革命的动机、革命的目的,在这段段沉重的对话和平静的独白之中,高高地矗立在天地之间。这样感人至深的语言,是对革命者力量的生动注解,是对纯洁党性的完美诠释。影片对李大钊心路历程的深情刻画,也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艺术概括。

正因其前景无限,愈呈文化之先进。影片用李大钊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理想,呈现出革命事业的美好前景。李大钊说:“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坚信,“为天下人谋幸福,才是真正的大事”。他们在中国播下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火种”。在影片的黑色基调中,一片片红色从零散、断续到大片出现,既昭示着中国革命的如火如荼,也点燃了观众的热血激情。影片结尾,革命先驱对中国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呼喊响彻云霄:“让我们铭记此刻,未来可期,中国可期!”

信仰和理想源于文化。正是有了先进文



《革命者》海报



□王南潮

日前,36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向警予》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热播。该剧由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河北省广播电视台等联合摄制,艺术呈现了革命先烈向警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回望了以向警予为代表的我党早期革命者的初心坚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刘毅然导演视角独特,拍出了信仰、拍出了精神,对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在其审美取向及时代价值上值得深入研究。

现实主义审美表达,引导观众回望初心、感怀信仰。《向警予》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展现人物的视角和表现历史的视野上实现了突破,突出精神层面的价值表达,实现与观众心灵的隔空对话,以理想主义的光辉教育激励观众。

贯穿全剧的是向警予同志忠贞不渝的革命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用通常的商业化的剧情设计和操作模式来表达,而是以其自身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品质赢得了口碑,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严谨的历史纪实性表述风格,通过逼真的场景再现、富有现代审美的人物塑造,真实全面地展现了向警予光辉的一生。虽时间跨度短,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的展现视角是独特的,它似一股潺潺的清泉,清澈灵动又扣人心弦,滋润人们生命的年轮,形成了其特有的史诗般的气质和表达。我们看到,该剧的审美取向和底色是跨越百年的历史时空,寻找与当下人们精神和追求高度契合的交汇点,使初心与信仰这一抹壮丽的色彩随着新时代坚定有力的步伐照耀远方。

向警予同志为革命事业历经千难万险也矢志不渝,她勇敢地冲破封建罗网、追求妇女解放、赴法寻觅火种、掀起五卅怒潮……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英勇牺牲。该剧还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陈独秀、夏明翰、恽代英等为共产主义信仰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的辉煌形象,挥扫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前赴后继、砥砺前行、艰苦历程。镜头语言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让人刻骨铭心地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岿然不动地屹立百年之久,就是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支撑,有这些英烈忠骨奠定的基石,才撑起不可撼动的中国红色政权的大厦,永远矗立在世界东方。全剧把共产党人为了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可贵精神刻画得深刻、厚重,体现了历史的沉思和时代的共鸣。

人性光辉的立体表达,引导观众审视内心,产生共鸣。《向警予》是一部历经四年精心打造精品工程,刘毅然导演以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虽着墨于革命斗争的血雨腥风、展现出革命路途的艰难曲折,但其核心却在挖掘革命者在艰苦卓绝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向警予的扮演者胡静,那坚毅的目光、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向人传递着乐观、自信、向上的精神力量。剧中向警予在法租界面对巡捕房的抓捕,镇定地和盛梦男烧掉机密文件后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对中国革命是何其忠贞,面对牺牲是何其豪迈!这个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蒙太奇无疑在观众心头产生了强烈震撼,彰显出女共产党员特有的美,烘托出人物英勇无畏的个性特质,完成了与观众的精神共鸣和心灵交汇。

《向警予》以唯物史观和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以独特的视觉语言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践行者向警予伟大的革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全剧主题鲜明,积极昂扬,故事跌宕起伏,剧情环环相扣,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戏剧张力,实现了人物塑造的鲜明性、故事呈现的鲜活。该剧成功塑造了一位具有铁骨柔情的巾帼英雄形象。铁骨,她在革命的征途中,大踏步走路,慷慨激昂讲话,横眉冷对一切反动分子,白色恐怖下不惧生死,在监狱般的牢房受尽酷刑而不低头,奔赴刑场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以致嘴里被刽子手塞满石子、双颊被皮鞭勒紧,她都毫不屈服,一副铮铮铁骨宁折不弯,感动天地;柔情,她对父母、兄长充满骨肉亲情,在狱中,这位坚强不屈的母亲,也会牵肠挂肚想起她的两个孩子。向警予的柔情尤其体现在广大劳苦大众身上,她常说:“我的一滴血每一滴泪只为中国劳苦大众而流。”在上海等地领导妇女运动时,她把那些受资本压榨的成千上万女工当成自己最亲的姐妹,这是革命者最真实的人性。

该剧每集开篇主题曲采用了向警予当年作词作曲的《激浦女校校歌》,明快的韵律,沉重而不苦闷,困苦而不失精神昂扬,催人奋进,展现理想光辉,焕发盎然生机。这在同类革命历史题材中是不多见的,展现出主创团队难得的匠心,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感奋着我们,让我们在新时代的今天依然深受鼓舞。该剧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什么“可”的严肃问题,给党史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

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重大突破在于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忠于历史、忠于人民,激发作品所创造的时代价值,给观众引发新的时代思考。《向警予》的创作团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仅彰显了他们高度的责任担当,严谨的创作态度、高超的创作实力,还展示了他们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高度关注和执着追求,在艺术与市场均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为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影视剧“河北现象”增添了新的风采。

实现与观众心灵的隔空对话

——电视剧《向警予》的审美取向及其时代价值

穿越生活表象 追问生活本质

——评安惠彦散文

文集《枯叶蝴蝶》

□关仁山

近日,作家安惠彦出版了散文集《枯叶蝴蝶》(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全书共分五辑,分别为“我心继续”“轻拾碎步”“血浓于水”“陌路红尘”“落幕无悔”。新作沿袭了她一贯的写作优点,并有新的挖掘和拓展。作品既能穿越生活表象,又能追问生活本质,呼应了新时代,保持了优雅的艺术品质。

安惠彦工作生活在保定阜平,她的作品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收放自如。她善于深层次思考社会,记录历史,张扬生命理想,挖掘人性光辉。她对人生准确、清醒和富有个性化的把握,源于她对阜平家乡和生活的热爱。

惠彦的文字,坦诚真挚,信手拈来,天高云淡。她不是文学专业出身,其文字自然就少了造作和桎梏,多了质朴和随性。她书写的人生,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何须繁华,下笔处已真情溢。

惠彦的文字,侃侃而谈,耐人寻味,启迪心智。她多年就职于县委办公室,其文风自然就有了几分公文的精炼,也正是这份精炼,让通篇文字又多了几分理性,多了几分睿智。

丰富的工作、生活、读书经历,加之她善悟生活真谛,极大地丰富了她的写作内容。逐篇看完惠彦的新作,你会看到一个女子的矛盾体,天马行空与中规中矩,正义慷慨与悲悯情怀,乏累无助与踌躇满志,狡黠圆滑与天然纯真。

惠彦是一个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的鲜活女子,她的文字真实再现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中的“我心继续”“轻拾碎步”两辑文字,有时深刻理性,有时激情澎湃,有时拈花微笑。读她的文字,你可以看到一个袅袅婷婷的感性女子,一个内心通透达观的职场强人;你也可以看到她诙谐幽默,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你还会看到她陷于生活的苟且,独自舔舐伤口、重整山河的果决。

惠彦自喻为枯叶蝴蝶。虽然她也在刻意收敛自己的花纹与图案,隐藏了自己的粉墨与彩色,逸出繁华的花丛,甚至故意变成一片如同死灰颜色的枯叶,但是,一身枯槁亦不掩其华。惠彦是一只翅膀两面都光鲜亮丽的蝴蝶,是一只冰雪聪明的蝴蝶,但有一点和枯叶蝴蝶相同,那就是美丽、珍贵、稀有。

新诗的蜕变与希望

□周思明

21世纪融媒体时代,新诗写作发生了明显的蜕变:有的面目全非,令人瞠目;有的自我把玩,令人疏远;有的封闭晦涩,令人猜谜;有的把写诗当成了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现象,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新的打开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体诗歌写作环境,使得因个体狂欢形成的大众娱乐成为诗歌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如今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甚至许多人已经不再读诗的客观原因所在。

这不禁让我们怀念起新诗的缔造者艾青等人。艾青们的新诗写作,可划归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糅合。从艾青、臧克家、北岛、舒婷等人的诗作文本上,仍可看出杜甫、李白等古代诗人的传承。以方法论,他们的诗歌自然采用了多元方法,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等也在其列。而以个性论,他们的诗也颇具个体自我的辨识度,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其是否具有自己的个性。读艾青们的诗,私以为具备了这些要素,这也是新诗的不竭生命力和希望所在。

以艾青为例,他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归来的歌》《雪莲》等作品,朴实、亲切、自然、深沉,带有浓厚的悲悯意识和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在遍地抗日烽火中,他为战争年代人民英雄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所感染,高涨的创作热情催生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等多部诗集。这些诗集,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它们倾诉民族的苦难,歌颂人民的抗争,

渗透时代的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昂扬。在艾青所有诗作中,《我爱这土地》是最为炽热感人、最为精练深刻的杰作,诗作结尾那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说是传唱至今的经典名句。诗的首句,集中展现作者对土地的赤诚之爱。在个体生命的短暂、渺小与大地生命的博大、永恒之间,作者为表达自己对土地最真挚、深沉的爱,将自己想像成“一只鸟”,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地飞翔。本来,鸟声是优美清脆的,不存在“嘶哑”的声音,但艾青却特别亮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当时悲壮的时代氛围、作者特殊的个性气质以及特殊的表达需要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产生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更能感到作者对土地的爱是如此执着、坚定,即使面对这样一片浸透着苦难的土地,诗人也要无条件地去爱,要永远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去为这片土地而歌唱。由艾青想到,新诗只有自觉地把诗人的内心情绪与中国大地的情绪、与民族的情绪融为一体,用诗笔去抒写时代,表达民族、吟唱大地万物的勃勃生机,才不致堕落到“有人写无人读”的绝境。

好的新诗需要坚持向上向善的美学诉求。以写新诗为使命和担当的经典诗人,对民族和民众的挚爱及其坚实的写作基础,他们所抱持的这种意绪是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同诗人个人气质的一种完美契合。这样的气韵在这些诗人的经典新诗创作中都有出色表现。可以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诗写作,形成了新诗写作的悲悯、悲壮情感,从而使新诗在朴素中呈

现出无与伦比的温暖感和厚重感。也正是有了这种温暖感和厚重感,赋予了新诗深沉坚强的力量,在这些新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悲剧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昂扬姿态。中国新诗写作因为有了这样的杰出代表,使得新诗有了“新”的希望与存在、发展的动力。

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新诗是古诗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认识到诗歌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和重要,就没有理由对新诗抱持绝望和摒弃的态度。新诗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于心灵的艺术,而不是什么“手艺”,所谓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近人情。因此,新诗无论是何种写法,无论人们对新诗抱有怎样的期待,当然,每个诗人的气质怎样,都要对审美边界进行突破。因此,不论诗人们的审美理想如何,对新诗的理解最终是怎样,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如何,他们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但是,文学本身、诗歌本身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精神、诗性灵魂。也就是说,文学是有灵魂的,诗歌也是有灵魂的,这个魂魄不仅仅在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容得以凸显的文学精神和诗歌精神,即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凝缩。

让河流缓缓流淌

——评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

□朱廷嵩

四川作家罗伟章的最新力作《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是一部具有史诗般品格的长篇小说。小说中随时出现的“清溪河”,滋养孕育了两岸儿女,也在作者平静的语调下缓缓奔流,裹挟着各类人物的命运,终结父辈的时代,展开新的历史画卷。

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小说中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大姐夫妇,还是配角灰狗儿、喜鹊等,众多人物的身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凸显他们鲜明的个性。人物的一言一行,构成了一幅逼真的农村众生百态图:大姐许春红性格泼辣,面对强势的村支书丈夫也不示弱。可她又是那样的善良,对于亲侄子诱骗姑娘的行径揭穿不误。她能接受昔日风光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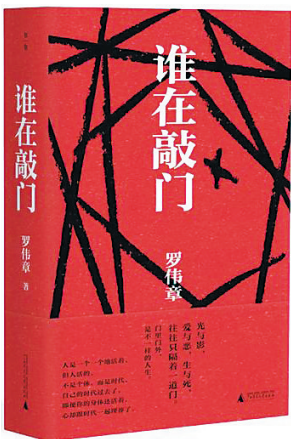
限的丈夫成为阶下囚的事实,却不能面对文明户的红灯笼被摘下的耻辱……大姐夫李文光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村干部,为李家岩村的发展和村民致富倾注了许多心血。可他也有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的是非功过又如何评说呢?四喜的招摇撞骗、二哥二嫂的自私自利、李志的玩世不恭等,都通过作者那平静的叙述,走进了读者心里。

小说的地域特色让人感触乡愁。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必以生养自己的土地为丰富的创作源泉。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陈忠实的白鹿原无不如此。在罗伟章的这部小说中,从方言、习俗到饮食文化等,都有鲜明的巴蜀特色。父亲出殡时的一整套流程,在喧嚣与热闹的场景下,反映出当地白事的繁琐复杂。家乡的山麓、河流、房屋、牲畜都能勾起童年难忘的回忆。当地“巴文化”历史的挖掘,也催生恋乡的情感。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落寮”之感,根本在于家乡的人和物的变化。尽管罗伟章说,他的小说

说突破群体和地域限制,只是反映人的日常,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熟悉,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乡愁的韵味。

小说的时代特征使其厚重大气。《谁在敲门》近乎零度写作,在娓娓道来中难免有一些琐碎和冗长,但它紧扣时代的脉搏,生动展现了扶贫搬迁、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时代主题。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今天,农村的耕种状况、农民的现实情况、地域的开发利用情况、中国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运行状况等,都尽收扫描在小说的宏阔视野下。小说点明了农业文明的根本所在,让人意识到重视农业、保护耕地等现实问题的重要性。这样的题材作品注定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意义。

李美皆教授说:“阅读罗伟章的小说,也许你不会那么愉悦,但文学的价值与力道就在这种不愉悦中实现。”《谁在敲门》这部小说的结局,可能会让读者深感失落,可在仔细回味中会发现,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



《谁在敲门》封面